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轉向及兩岸高校合作 議題思考

劉子雲

廣州大學教育學院講師

摘要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力及未來趨勢。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經歷從單向、局部性的、以效法與追趕西方高等教育為目標的“國際化”行動，轉向了雙向、整體、全面的、以“合作共贏”為目標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高等教育國際化突破了狹隘的“國家權力”邊界和“市場利益”取向，轉而以培養世界公民和公共責任擔當為價值圭臬，彰顯了高等教育的社會責任。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高等教育在國際化的進程中既存在分歧，也存在優勢互補的條件，促進兩岸高校合作交流，是兩岸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理性訴求。

關鍵字：高等教育；國際化；兩岸；高校合作

【作者簡介】 廣州大學教育學院講師，博士。地址：廣東省廣州市大學城外環西路 230 號，510006。E-mail: liuziyun@aliyun.com

【基金專案】 廣東省國際暨港澳臺合作創新平臺專案“港澳臺區域教育品質保障政策合作研究”（2014WGJHZ002）；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廣東與臺灣高等教育品質保障政策比較研究”（GD14CJY04）。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涵

國際化是中世紀大學誕生時“與生俱來”的特質。因大學在中國大陸誕生較晚，高等教育國際化並未成為顯性議題。新世紀以降，隨著“留學熱”成為日漸興起的高等教育現象，為高教界所熱議。從知名研究型大學到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高職院校，各級各類高等教育機構基本都有提出具體的國際化目標，其中多數院校與其他國家的高校開展了實質性的交流合作。高等教育國際化在初始階段被稱為“與國際接軌”“跨境教育”（Cross-Border Education）或“合作辦學”。從鴉片戰爭時期“師夷長技以制夷”時期的“西學東漸”，到清末民初東洋留學潮，到“庚子賠款”（Boxer Indemnity）扶持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再到今天的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現象，高等教育國際化經歷了從“借船出海”到“造船遠洋”，再到“開船搭客”的過程。當下即便是美國，作為高等教育強國，也正在進行一場稱得上“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大學發展運動”，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招收大批留學生，持續改變著社區學院的生源結構，通過大批著名的私立、公立大學在東亞、南亞建立衛星學校，包括分校、合作共建大學。如上海紐約大學，它是美國紐約大學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合作共建的跨國合作型大學。

高等教育國際化與經濟全球化、社會流動相互聯動，與“自由貿易”和“資本在全球流動”的市場框架密不可分。技術理性主導下的世界市場經濟，通常決定了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類型結構和方式。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建構的更為開放多元的社會，促進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高等教育的開放性辦學。世界各國將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國際交往、跨文化互動能力的青年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標，本質上就是要培養適應全球化所需要的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國際性人才。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WTO）、二十國集團（G20）、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金磚國家（BRICS）的核心成員，並且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體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對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在致力於推動中國與東南亞、西亞、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的經貿合作的同時，也推動了高等教育的局部改革。為保持與經濟發展戰略的一致性，不同區域的高等教育佈局結構進行了適應性調整，包括專業設置、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模式等。如華南、西南地區的高校，致力於培養滿足東南亞經濟圈所需要的人才。廣東、廣西、雲南的高校設置了相關具有跨國特色的學科專業，位於東盟永久會址南寧的廣西民族大學專門成立了“東盟學院”，開設了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等東盟地區小語種特色專業，形成

了東盟語言、東盟法律、東盟經貿、東盟民族與文化等頗具特色的學科群。廣西外國語學院則成立了東南亞語言文化學院目前開設英、泰、越、漢、緬、法、印尼、日、柬、西班牙等 10 個語種及各類本、專科專業 70 多個。廣西諸多高校設立“政府獎學金”吸引大量東南亞的留學生，促進了該地區高校與東盟教育文化的“無痕接軌”。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來的概念與行動，是指“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教育制度、教育理論和教育行動三個層面的、超越國家和地區邊界的資訊、人員、專案的交流、合作與互動”（劉暉 2005）^①。當代主流觀點認為，“國際化”旨在強調自由貿易刺激了學術流動，反映了一種自由資本市場的經濟互動原則。當前的認識將高等教育國際化視為一種私人商品，而非公共責任（Philip G. Altbach, Jane Knight 2007）^②。雖然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經濟性原則備受詬病，但也反映了高等教育主體意識的覺醒，擺脫了國家主義、單邊主義、殖民主義高等教育辦學取向的思維閹限，它是通過高等教育主體的辦學自省、與他國高等教育的比較、對全球高等教育發展態勢的綜合分析與預測，順勢提出高校跨國合作進行培養人才、科學研究和文化教育交流的計畫與活動，符合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實踐理性。高等教育自省是高等教育主體對本國高等教育歷史、現況及未來的省思，包括對高等教育品質、高等教育特色、高等教育優勢、高等教育困境、高等教育出路等方面的全面考量，最終決定是否要通過國際化的手段來改善自身境況。通過對國外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和特色、人才培養模式、品質提升策略等各方輿情的比照，發現可以將外國高等教育作為本國高等教育的鏡子，從中看到對方諸多值得參考的經驗。因此在比較的過程中，同時也能找到本國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出口，即超越“本國”的界限與有限的視野，向外國先進的高等教育“取經求道”，以求相互平等對話、相互學習、共同發展。固然，高等教育國際化並非擯棄自我而“西化”或“去本土化”，而是建立在自我省思和國際比較視野下作出的理性規劃與行動。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人類社會被捲入一個多元高效的共用體系，思想、科學技術、物質產品、資訊等，能夠通過航空、高速列車、衛星、網路被迅速分享給個世界上每個角落的每個人，使人們享受到愈加便捷和豐富多樣的生活。同時，

^① 劉暉：《論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指向與內涵》，《教育與現代化》，2005（2）：3-7。

^② Philip G. Altbach, Jane Knight,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all/Winter 2007 vol. 11.pp290-305.

全球化也讓人們面臨著氣候變化、資源開發、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科技倫理等共同的世界性問題。這種全球化議題給高等教育發展帶來巨大挑戰，高等教育應該擔當怎樣的社會責任？該如何行動才是恰切的，才是符合人類社會需要的？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來推動對世界的認識？從“高等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③（潘懋元 1997）的角度講，高等教育適應社會的發展是高等教育與社會互動之必然性的因果關聯，據此邏輯，謀求對全球化和“地球村”社會的適應，培養世界市場及在人類世界面臨的公共問題所需要的人才，是高等教育實踐的內在邏輯和現時背景下的理性選擇。

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走勢

（一）從自然生成轉向人為推進

大學誕生於中世紀，誕生之初便附帶了國際性屬性。包括歐洲不同地區的生源背景、所使用的教學語言、教師身份、畢業生就業的流動性等，均表明大學之起源有一種跨國跨領域合作的特質。譬如建立於 12 世紀的巴黎大學的師生中，就有很多英國人、斯堪的納維亞人、德國人、義大利人等，而中世紀大學的教學語言選擇了統一使用拉丁語，超越了地區和民族的界限。

到了近現代，高等教育逃離教會專權和民族國家的封閉管制，主動推進國際化。資本主義帝國殖民擴張時期，帶來世界移民新浪潮，流動成為受教育者的一種常態。雖然民族國家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因為權力的劃分，造成了交流機制的阻隔，但科技革命和經濟貿易的全球化，尤其是二戰以後世界市場的形成，導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各國不得不主動打開高等教育的封閉之門，積極創造條件，通過國家政治主體、教育主體和高校法人機構，主動地推動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以培養跨國人才，參與國際競爭。部分高等教育強國和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紛紛制定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長遠規劃，將高等教育國際化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甚至作為國家的“意志”和行動，從國家重大改革方案、發展計畫和政策實踐層面來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

中國大陸分別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和《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提出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長遠規劃，其中指陳：“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開展多層次、寬領域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提高我國教育國際化水準”。“借鑒國際上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經驗，促

^③潘懋元：《教育基本規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與實踐中的運用》，《上海高教研究》，1997 年第 2 期。

進我國教育改革發展，提升我國教育的國際地位、影響力和競爭力。適應國家經濟社會對外開放的要求，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使得“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並提出要鼓勵“985 工程”和“211 工程”學校的“優勢學科面向世界，支持參與和設立國際學術合作組織、國際科學計畫，支持與境外高水準教育、科研機構建立聯合研發基地。加快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準大學的步伐，培養一批拔尖創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學科，產生一批國際領先的原創性成果，為提升我國綜合國力貢獻力量”。綜而觀之，國家教育部等相關部門大力推進高等教育“走出去”與“引進來”戰略，包括對國際性人才的培養，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和優秀青年教師，為大學教師走出去提供平臺，積極推動大學教學和科研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以提升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

（二）從單向流動走向雙向互動

過去高等教育主體通過對高等教育品質、特色、優勢、困境、出路的考察，以及通過對國外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和特色、人才培養模式、品質提升策略的比照，從中看到彼此的優勢和可借鑒的經驗，並在比較的過程中，尋找如何更好地建設本國的高等教育及找到未來的出路，即超越“本國”的界限與有限的視野，提出向外國先進的高等教育“取經求道”。但這種“借鑒”與“學習”，僅僅是一種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單邊行動”與“簡單模仿”。

一方面，這種主動謀求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踐通常是一種單向流動的過程。即宣導“落後”學習“先進”，尋求獲得合作方大學的資源與支援，謀求與國外主要是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高等教育強國或者發達國家掌握著話語權，合作雙方處於不平等的關係之中，一方受到另一方的鉗制，尋求合作的一方往往顯得比較被動，合作雙方相互活動的空間也比較狹窄，合作的天平並不平衡而傾向于一方。隨著全球話語體系的建構，在“全球規則與世界秩序”的規範下，各國高等教育主體都試圖打破本國高等教育與他國高等教育系統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樹立本國高等教育自信，展開平等對話、交流與合作，以建構平等的高等教育合作關係，在平等互動的基礎上展開跨國跨校的大學合作。

概言之，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再是簡單的“落後”對“先進”的學習，不再是“二流”效法“一流”，國際化道路並非要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建設成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設成麻省理工學院，而是在自信、平等、

互信、互動和“互利”的基礎上，展開各國高等教育相互交流與合作。

（三）從國家競爭邁向區域合作

過去高等教育國際化之進程，通常是基於雙方比較之後，以借鑒對方辦學經驗或超越對方辦學水準為目標的競爭過程。部分合作通常是在兩國之間進行的，反映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科技等領域的競爭關係。如今伴隨地緣政治、經濟的區域化，高等教育區域性合作成為了大學國際化的主要方式。20 世紀 80 年代歐洲共同體便推出了“伊拉斯謨計畫”（Erasmus Programme），即歐盟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計畫，以促進流動的學生和學者到歐盟或者去非歐盟國家學習和交流。90 年代歐盟又啟動了“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吸引了 40 多個國家加入了歐洲高等教育區，以促進歐洲高校學歷學位證互認、增加國際學生的就業機會，推動歐洲高等教育和科技一體化。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三國政府部門聯合發起了亞洲校園計畫（CAMPUS Asia），旨在創新亞洲地區大學的國際化，為師生提供跨國學習與科研的機會。

類似的高等教育區域化還有東盟大學聯盟（ASEAN University Network，簡稱 AUN），它的成立，旨在推動東盟各國高等教育資源的整合和區域性人才的培養與流動。這些從區域化考慮制定的高等教育合作計畫，為促進教學科研資源分享，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與輸送人才，提供了方便教育資源整合的優勢，強化“強強聯合”效用，比類似於“軍備競賽”帶來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更高。

（四）從校際合作走向大學聯盟

除了傳統上的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合作以外，以往大學合作的主體同樣受到局限，所謂“國際化”僅停留在校際之間，合作規模及領域相對較小。當前“跨國性大學聯盟”逐漸成為大學國際化的基本合作形式。目前主要由世界一流大學聯合成立的聯盟包括：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環太平洋大學聯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簡稱 APRU）、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簡稱 AEARU）、國際研究型大學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簡稱 IARU）等。中國大學也在積極謀求通過區域整合和一體化進程加入國際大學聯盟。如中國高校與東盟、日本、韓國等高校正在尋求更進一步的親密合作。

（五）從單項展開轉向綜合推進

以往的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通過招收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來推進學生國際化，或者招聘語言和學識能力強的各國教師實現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或者通過

“2+2” / “1+3” 的人才培養模式推進人才培養的國際化，或者通過開設多元文化課程來彰顯課程國際化程度。當前人們審視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面向越來越廣，需要達到國際化標準的評鑒指標越來越綜合，包括理念、人才培養、科研、師資、教學、聲譽、著名大學聯合攻關人類發展的課題等諸多方面。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用教學、科研、知識傳遞、國際視野 4 個方面的 13 項指標衡量大學綜合實力。我國的高等教育要想在國際上獲得立足之地，需要在更為廣泛的領域作出努力，綜合推進高校尤其是國際知名、國內一流大學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領域的全面國際化。

（六）從物理空間流動轉向資訊化交流

在資訊並不是很發達的時期，國際學生的學習必須要發生物理空間上的位移，親自到目標國的高校機構去學習。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將人類社會的一切捲入共用體系，思想、科學技術、物質產品、資訊等，通過航空和高速列車、衛星和通訊技術被迅速分享給個世界上每個角落的每個人，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學習的方式。大資料時代，網路資訊技術日漸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橋樑。尤其是數位媒體、社交 APP、微課程、雲端學習平臺等成為各國大學建立關係、溝通和交流合作的重要方式。網路教育或遠端教育對於資訊傳遞的高效處理方式，能夠高效地完成學校資訊流覽，網上選課、聽課、評課、課堂互動，輔助完成學生交流項目、科研合作計畫的洽談、學生面試、網路教學和國際教師招聘等。這為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提供了過去無法比擬的優越條件。高等教育國際化正從以物理空間的流動為主要標誌，向網路虛擬空間的資訊化學習轉變，全球師生可以在節省差旅、住宿等人力物力和時間成本以外，高效地提升了學習效率和高等教育資源的有效整合。

（七）從文化交流拓展為“第四外交”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核心任務之一是要培養適應經濟全球化的人才，發展國家的高等教育事業。事實上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意義已不囿於教育本身，而在經濟、文化、政治等領域發揮更大的價值。尤其是通過高等教育的國際合作，可以開展國際文化和藝術交流，在國際關係中發揮文化外交的作用。

為推動漢語加快走向世界，提升中國語言文化影響力，從 2004 年開始，中國大陸在借鑒英、法、德、西等國推廣本民族語言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在海外設立以教授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教育機構“孔子學院”。《孔子學院章程》明確規定，孔子學院作為非營利性教育機構，其宗旨是增進世界人民

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瞭解，發展中國與外國的友好關係，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發展，為構建和諧世界貢獻力量。孔子學院由國家漢辦管理。國家漢辦作為中國教育部直屬事業單位，將目標定位於“為世界各國提供漢語言文化的教學資源和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海外漢語學習者的需求，為攜手發展多元文化，共同建設和諧世界做貢獻”。其主要職能包括：支持各國各級各類教育機構開展漢語教學和中華文化傳播；制定、完善和推廣國際漢語教師標準、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選派和培訓出國漢語教師和志願者；開發和實施漢語水準考試；實施“孔子新漢學計畫”，支持開展中國研究；組織管理孔子學院獎學金。孔子學院建設快速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漢語和瞭解中華文化的視窗，中外文化交流的平臺，加強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友好合作的橋樑。在中外雙方的共同推進下，截至 2012 年，已在 108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 400 所孔子學院和 500 多所中小學孔子課堂，成為各國學習漢語言文化、瞭解當代中國的重要場所。孔子學院也是中國大陸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重要視窗和平臺。

（八）從局部協作轉向整體推進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文化全球化和社會流動現象的反映，是高等教育理念的革新，是高等教育實踐的創新，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過程，是高等教育體系的豐富，是高等教育的趨勢。從自然到人為、單向流動到雙向互動、國家到區域、單體到群體、單向到綜合等，表明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個演變的過程，是沒有終點的過程。開放時代初期，剛跨出國門的高等教育被稱之為“合作辦學”，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開始“與國際接軌”，而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和高等教育自信的樹立，立足本土的主體地位，提出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概念。這不僅反映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名稱的流變，也反映他的理念、表現形式和實踐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革而處於流變中。而從校際合作到國家間合作，再到區域性合作，表明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條沒有終點的路，在開放社會世界裡不斷流變與發展。因此，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認識高等教育在不同時間與空間範圍中的一個動態的概念符號，具有動態性和未來不確定性的雙重特徵。

三、兩岸高等教育合作之探討

（一）兩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現況

開放兩岸“三通”以降，高校之間開展了緊密合作，師生互訪與交流學習的

頻次愈來愈多。但因兩岸關係波詭雲譎，社會環境、意識形態及政治博弈對兩岸高等教育的正常互動產生了波動性影響。新政治環境背景下，兩岸師生交流、攻讀學位或短期進修的人數銳減，引發了臺灣高等教育的小震盪。另受臺灣地區對陸生實施的“三限六不”政策影響，挫敗了陸生來台學習的積極性。

臺灣高校的國際競爭力相較大陸，有所降低，陸生入台攻讀學位的人數和短期交換的意願降低。在 QS2016/17 年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國大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皆進入全球 50 名以內，分別排名 24、39、43 名，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分別排名 27、36、44、55 名，臺灣大學位列第 68 名。QS 排名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大學的國際化程度，主要參照指標係數包括國際教師比、國際學生比，不過在這兩項的得分上，中國大陸高校和臺灣的大學都比較低。但相對來說，在國際師生比部分，大陸頂尖大學得分要低於臺灣（參見下表）。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6-2017

Universities	World Rankings	Asia Rankings	International Facult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verall Sc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2	1	100	90.8	91.50
Tsinghua University	24	5	43.3	28.1	86.0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7	2	100	99.3	85.4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34	13	92.2	64.4	82.6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wan	68	21	80.7	36	70.2

資料來源：根據 9 月 6 日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發佈的“2016/17 年度 QS 世界大學排名”相關資料整理，網址：<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6>

為了提升高校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大陸和臺灣的高等教育都在致力於促進高校國際化的行動，尤其是在“南進”的部分領域，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之高教發展與臺灣地區“新南向政策”之高教戰略選擇發生了重疊，展開了高教資源的角逐。臺灣地區在兩岸政治角力中，為找到替代性市場，積極構建經濟、文化和教育在東南亞領域的合作框架，於是在高等教育合作領域，提出“新南向人

才培養政策規劃”。根據臺灣教育部門公佈的相關精進策略，其核心在於推動：（1）新住民子女的語言教育和文化交流；（2）青年向東南亞國家流動及提升國際參與與交流能力；（3）電子商務、諮詢工程、生醫產業等領域的培訓及人才供輸；（4）師生出境交流、研修；（5）設置交流據點、多元合作；（6）雙向人才培養等。^④從其策略方向觀之，這一政策才剛剛處於起步階段，雖然如高雄文藻外語大學在培養越南語、泰語和印尼語人才方面起步較早，而與大陸高教在與東盟高教合作交流的情況相比，仍有一定距離。

受國家發展戰略因素之影響，中國大陸高校借“一帶一路”之海上絲綢之路的契機，利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經濟和文教交流合作的平臺，進一步拓展了與東盟各國高校的緊密合作。2014年，中國以及泰國、老撾、印尼、柬埔寨等東盟國家的17所工科大学達成協議，成立“中國—東盟工科大学聯盟”。這17所學校包括9所國內院校和8所東盟國家院校，分別為：北京理工大學、重慶大學、大連理工大學、東南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含威海校區）、華南理工大學、天津大學、同濟大學、西北工業大學，以及柬埔寨柴楨大學、老撾沙灣拿吉大學、印尼泗水理工學院、柬埔寨亞洲學院、老撾占巴塞大學、泰國瑪希隆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柬埔寨棉則大學。該聯盟旨在培養更多國際化的工程人才，將主要在工程技術領域展開本科、研究生層面的雙學位聯合培養等方面，加強區域高等教育的合作與交流。臺灣地區的新南向政策才處於起步階段，而大陸的“一帶一路”戰略啟動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就已經推動了與東南亞國家接壤的華南邊境地區的高等教育走向了國際化。

除上述廣西外國語學院以外，廣西民族大學可謂大陸高校與東盟高校“接軌”最為緊密的高校。該校東南亞語言文化學院設有越南語、老撾語、泰語、柬埔寨語、緬甸語、印尼語、馬來語等7個東盟國家語種專業，以及外國語學院設有英語、法語、翻譯等3個專業，與泰國瑪哈沙拉坎大學、老撾國立大學、印尼丹戎布拉大學合作建立了孔子學院；是首批“國家外語非通用語種本科人才基地”“中國—東盟法律培訓基地”“中國—東盟旅遊人才培訓教育基地”“東盟國家漢語人才培訓中心”，泰國教育部在該校建立了泰語水準測試點。該校還成立了東南亞研究所、廣西越南研究中心、廣西泰國研究中心、廣西馬來研究中心等專門研究機構。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副總理

^④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16）：“教育部”新南向政策—以人為本·用心交流，“教育部”全球教育諮詢網：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FD390654B72966F3

范加謙、泰國詩琳通公主、老撾總理波松及國會主席巴妮·雅陶都、緬甸副總統賽茂康等東盟國家政要都曾到校參觀訪問。天然的地緣優勢，以及長久的歷史合作基礎，為大陸原本處於邊疆偏遠地區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優勢資源。這也是中國大陸相較於臺灣地區“新南向政策”更具比較優勢的緣由所在。儘管各自優劣明顯，兩岸在諸多方面依然可以發揮各自優勢，在多個領域相互合作，共同推進兩岸高教發展。

（二）兩岸高等教育合作發展之思考

生源可相互補給。1978年，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為1.55%，1999年開始大學擴招，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快速上升，於2002年達到15%，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階段進入大眾化階段，而臺灣地區高教1950年就已達到此水準。2012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30%。截至2015年，中國大陸普通高校共計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高考錄取率從2000年的59%上升到2014年的74.33%；在校生規模達3700萬人，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40%，略溢出全球平均水準。目前臺灣少子化現象，高校生源供少於求，大陸仍可釋放25%的生源空間供臺灣地區的大學選擇。“習馬會”後的記者會上，馬英九指陳，他向習近平先生表達了希望大陸專科生有意向升本的學生來臺灣繼續學習，他說臺灣科技大學目前有相當的缺口，越南、泰國、印尼用公費派講師來台科技大學念研究所，臺灣都非常歡迎。雖然兩岸高校合作存在基礎，不過臺灣地區不得不考量的一個前提是，隨著留學熱，臺灣招收陸生仍要與歐美日韓等國家競爭，還要受到其他方面因素影響。

師資可相互流動。臺灣高校的師資多具備歐美大學的教育背景，多數高校70%以上教師有博士學位，有些高校這一比例甚至高達90%以上，如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占比高達95%。由於“少子化”影響了生源結構，臺灣高校教師職業也可能面臨就業困境，一方面由於學生規模縮減，高校被迫合併重組，師資出現“過剩”現象，或被迫“轉行”。另一方面臺灣本土培養的碩博士亟待就業，高校教員職位基本處於飽和狀態，碩博士畢業生面臨就業難問題。據臺灣教育部門統計，2015/16年度臺灣地區碩士班、博士班畢業人數分別為57,461人、4,000人，在就業前景看緊的情況下，需要尋求更廣闊的就業市場。從師生比來看，臺灣高校2015/16年度高校在校生總為1,332,445人（含大學、獨立學院、專科院校（公立與私立）的碩博士生），專任教師（含助教）為48,696人，生師比為27.3:1（教育部，2016）。中國大陸高校在校生（僅統計研究生培

養機構、本科院校、獨立學院、高職（專科）院校的學生數）為 27,324,688 人（各級各類高校生總約 3700 萬），專任教師為 1,534,510 人（不包括研究生培養機構教師人數，研究機構的師資一般與普通高校師資發生重疊，缺乏相關統計資料），生師比為 17.8:1。表面上看，大陸高校教師比例要略高於臺灣，但因大陸仍在持續擴招，需要擴充師資陣容。但從教師背景來看，大陸國際教師比例偏低，而臺灣教師基本上具有國際化的背景，兩岸可建立師資共用的合作機制，促進教師交流互動。

政策可相互支持。從兩岸宏觀高等教育發展來看，兩岸相關部門應為高校合作營造平穩的教育環境，建立兩岸高等教育常態化合作機制，制定合作的具體方案，使合作制度化、可操作化。積極推動兩岸高等教育的校際合作和教師訪學。大陸高校與臺灣地區高校可以建立更多姐妹學校關係，進一步完善互派本科生（學士班）、研究生（碩博班）到對方學校交換學習、學分互認、攻讀學位等制度。完善陸生赴台學習的相關優惠政策，提升高校吸引力。

四、結語

高等教育國際化已在全球各國積極推進，也是未來之趨勢。國際化儘管它的輪廓並不是很清晰，但無疑是高等教育的一個核心力。對於某些國家而言，既是文化軟實力，經濟博弈的推動力，也是國家綜合國力提升的重要表徵，可能已經產生了巨大的效益，對於另一些國家或地區可能是一個“利基市場”（Niche Market）^⑤（Philip G. Altbach 2007）。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國際化要讓公眾受益，而非簡化成一個利潤生產中心，囿於工具理性的把柄。

^⑤ Philip G. Altbach, Jane Knight,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all/Winter 2007 vol. 11.p305.